

## 1990年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林 化

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历史系、吉林师范学院、吉林市档案局、《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河北省承德市园林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十六家科研、高校、出版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1990年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8月2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8月26日在吉林省闭幕。到会代表共计127人，其中日本学者10人，香港学者1人。向大会提交论文74篇。

本次大会以“乾嘉道时期的中国”为中心议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清朝重要的历史时期。它从公元1736年开始，到1850年，共经历114年时间，占清代全部268年历史的近二分之一。在此之前，顺、康、雍三朝，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生产恢复，经济开始繁荣，人口增多，国力加强，社会呈向上发展趋势；在其之后，西方列强武力侵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爆发了太平天国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清王朝日益削弱，并走向灭亡。因此乾嘉道成为清代由强盛走向衰弱，从一个独立完整的封建主权国家，变为受外来侵略者欺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重要转折时期。

而与此同时，世界形势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了气势磅礴的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1775年——1783年，美国赢得伟大的独立战争的胜利，驱逐英国殖民者，建立起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十八世纪，欧洲还出现了启蒙运动，文化思想界发生深刻变革。上述一系列重要事件，导致世界资本主义飞速发展，也使得中国社会与先进国家民族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大。但是，关于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却一直很薄弱，尽管自辛亥革命后，随着人们对清朝历史的重视，乾嘉道研究逐渐开始，出现了一批颇具成就的研究文论。尤其是近年，更有了迅速发展。然而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则明显落后于顺康雍三朝，以及晚清史的研究，鉴于上述情况，大会筹办单位确定了“乾嘉道时期的中国”这一主题，期望通过广泛热烈的讨论，开阔视野，探索新问题，进一步推动乾嘉道的学术研究。

在全部论文中，有关乾隆朝的论著为最多。刘裕仁、高翔合著的《从人事变动看乾隆朝政治的演变》一文，将乾隆朝政治发展分为开拓、全盛、动荡三个时期，从每个时间任用官员的不同特点，着手考察了乾隆朝政治演变的基本途径，以及专制皇帝与官僚队伍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布尼阿林的《从乾隆帝在热河的重要政治活动看他的历史功绩》一文，对乾隆帝在热河进行的木兰秋狝、接见赏赐、修庙立碑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进行分析，论述了这些政治活动在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起到积极作用，并肯定了乾隆帝这方面的历史功绩。李鹏年《试谈乾隆治理西藏措施》一文，追溯了清代顺治朝在乾隆初年，清政府先是利用蒙古和硕特汗王对西藏进行间接统治，而后依靠西藏地方高级僧俗掌

政的历史，着重论述了乾隆中央政府逐步对西藏实行直接管辖，提高驻藏大臣地位，集西藏地方一切权力于其一身的具体过程，并对乾隆十六年颁行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乾隆五十八年《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进行分析。夏家骏《乾隆涉外立法综述》一文，专门搜集整理乾隆朝有关对外的政策法规，其中包括贸易法规、对邻近小国的政策、对天主教的政策、接见外国使节的仪式规定、西洋人来京的法令等等。指出乾隆朝的涉外立场带有明显的继承性、两面性。它继承了明朝的某些对外政策，更继承了顺、康、雍三朝的涉外立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法律原则上，则表现出既坚持民族自卫，又有某种程度以“老大自居”的两面性。赵德贵《清代乾隆朝“推广捐复之例”研究》一文，通过对捐纳制度的研究，考察乾隆朝的政治发展，阐述了乾隆朝捐复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以及它与当时社会的关系。梁希哲《略论乾隆惩贪》、刘凤云《乾隆惩贪与贪风愈炽》两文，都以乾隆朝的吏治问题为出发点。梁文着重论述乾隆帝的惩贪措施，及乾隆朝的几桩贪污大案。刘文则揭示出乾隆朝惩贪愈严，而贪风愈甚的吏治现状，认为乾隆帝巡游无度，纵资挥霍所及予社会的影响，乾隆执法不一和政策的失误，以及重用和珅与和琳纵贪是导致这一怪现象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滕少箴《乾嘉道时期察吏之管见》一文，则对京察大计等对官吏考察监督制度的分析，论证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并不能解决吏治腐败问题。李治亭、林世慧合著的《康乾“盛世”探源》一文，从削除“三藩”与康熙朝走入“盛世”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康乾”盛世出现的历史原因。马协弟《汉军出旗刍议》一文，考察了乾隆年间汉军一度大量出旗为民的问题，认为汉军出旗始于乾隆七年以后，并论述了汉军出旗的原因，及出旗后的族属问题。佟永功、关嘉录的《乾隆期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一文，利用清代官方典籍及近年发掘的最新档案史料，证明从顺治三年起直至乾隆十七年以前，盛京并未设立内务府，只有上三旗包衣佐领三员。乾隆十七年，始设立盛京总管内各府，并揭示这一历史过程的社会背景。指出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是对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金宝森《浅谈乾隆对发展满文的贡献》一文，从满语发展的角度，通过对满文的起源及改进，乾隆帝敕谕研制满文篆字和满译大藏经等问题的探究，阐述了乾隆皇帝对满族文字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付清远《乾隆建筑风格与清乾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一文，则通过对由乾隆皇帝授意规划建造的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其整体和单体建筑布局，及由此而体现出的团结风格、和谐风格、功能使命的统一风格的分析，揭示出乾隆帝问题建筑上所深寓的巩固加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用心。姜相顺《乾隆帝东巡谒祖陵期间盛京皇宫的增建及悬挂珍藏》一文，正如题目所示，对乾隆帝四次东巡盛京谒陵期间，盛京皇宫的增建、各种悬挂以及珍宝文物、档案典籍的收藏状况进行了考察。

乾嘉道时期的文化思想，是论者研究的另一热点。乾嘉学派是这方面的中心议题。王俊义《乾嘉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一文，首先列举出迄今为止，人们对乾嘉学派毁誉不一的状况，指出只有消除各种偏见，才能客观地予以评价，同时论述了乾嘉汉学在四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局限性，并得出结论：乾嘉学派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黄爱平《凌廷堪学术述论》一文，对乾隆学派的重要学者凌廷堪学术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凌廷堪在经史小学、天文乐津方面的贡献。指出其学术风格和治学成就，集中体现出皖派学者的特征，推动了一代学术的发展，而其治学道路和思想主张，也反映了皖派以至乾嘉学者的局限。王冬芳《析乾嘉学派的形成和

进步意义》就乾嘉学派形成发展的历史原因及对社会的影响做了探讨。宝成关的《略论嘉道经世思想》是一篇考察继乾嘉学派走向衰微，知识界经世思想及其学派的崛起、发展的文论，文章阐述了常州学派兴起，今文经学昌明的历史条件，嘉道经世思想的内容、要旨，及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巨大影响。敖坤《清代禁毁小说及其影响》一文，着重论述清政府查禁销毁小说的文化专制政策，指出清政府为加强思想控制，从清初至清末，始终奉行禁毁小说的措施，销毁大量书籍，这一政策虽然最终失败，但给清代文艺发展带来严重恶果。王薇的《清中叶中国古籍的对外流传与影响》，对清中叶中国古籍向海外流传的过程、特点，古籍的传播者及其活动等做了论述，并且认为，这种流传确立了汉学研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推动了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促进了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及世界文化的交流。李玉奇《清代金石学全面繁荣的时期——谈乾、嘉、道时期的金石学》，将这一时期的金石学分为乾隆初期、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道光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清代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文章对翁方纲、毕沅、钱大昕、王杰、孙星衍、王昶、阮元等人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做了详细具体阐述。刘国君《论清乾、嘉、道间的版本学成就》一文，从版本目录学著作的大量涌现、版本鉴定理论的初步建立与鉴定方法的完善，对历代版本的评论及各类版本的价值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版本目录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张佳生《清代中叶满族词坛兴盛的原因》，对乾嘉道时期满族词人及作品数量大幅度增多，词作风格多样化，词作内容更为广阔的兴盛局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这种兴盛局面的出现是由于清中叶满族文人数量的增多，词学的繁荣发展，文化专制政策对文人思想的束缚，以及文坛风气的转换等因素所导致。虞万里《正、续清经解编纂考》一文，对清代汇刊儒家经典的风气进行了考察，并着重分析《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的刊刻过程及其版本的流传。

乾嘉道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与会代表所感兴趣的问题。姜守鹏《乾嘉道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一文，对清代该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做了概括性论述，文章指出，“鸦片战争前夕，虽然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旧的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被冲破了几个缺口，但是它仍然很牢固，并且严重地束缚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李华《清代湖南的商业》一文，全面探讨了清代湖南商业的发展状况，其中包括湖南商业的种类，城市商业、农村商业的发展和原因，湖南商人及其商业活动等等。郭文韬《试论乾隆时期的传统农学》，以乾隆年间刊刻的两部重要农书，《知本提纲》、《授时通考》为依据，对传统农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如三才论、阴阳五行论、四农必会论、耕道论、类壤论等等，进行深入分析，同时阐述了传统农书的大型化和综合化的特点。刘小萌《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买卖——根据土地契书进行的考察》一文，依据所发现的乾嘉年间的二十件地契文书，论证清中叶畿辅旗人土地买卖的主要形式和特点，认为通过价买途径积累土地、采用租佃制的土地经营方式，已成为其时畿辅旗地经济关系的基本形态。梁志忠《乾嘉道封禁时期的东北流民》，考察了清代封禁东北的政策以及东北流民的活动，指出这种倒行逆施的封禁政策不但没有阻止流民进入，反而促使汉族农民大量涌入，促进了东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林明棠、常玉文、张丽光合写的《清乾、嘉、道时期的吉林烧锅业——资本主义的萌芽、胚胎和始点》一文，在分析考察了清中叶吉林烧锅业兴办、发展、经济性质以及经营管理的过程之后，得出结论，由于吉林烧锅业分工协作，统一管理，面向市场的特点，使它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成为封建社会内部

资本主义的胚胎和始点。

也有文章对道光朝政治和鸦片战争进行了探讨。倪军民《试论鸦片战争前夕的“言路”与禁烟运动》一文认为，鸦片战争前夕是清代“言路”最为通畅开放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鸦片的输入，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冲击了封建统治，导致言官对鸦片问题的大量奏议，构成下情上达的主要“言路”渠道，并深刻影响道光帝。言路畅通与禁烟运动戚戚相关。闻少华、周溯源合著的《评析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四次选择》一文，对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多次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探索。李书源《道光皇帝与鸦片战争》一文，分析了道光帝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的做为，认为中方的失败，道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但是以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实施了一条妥协路线，则是不客观的。禁烟与道光不无关系，而其议和，也与后来清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态度有所区别。袁间琨、董守义的《试论道光季年对外开放问题》，着重分析了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出现的开放意识。文章指出当时文化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爱国要求中，混有大量的排外情绪，是低层次的爱国主义，使得开放的呼声很微弱，以致轻易地被闭关的舆论吞噬。在新旧社会转型的时候，传统文化发挥出沉重的历史惰性作用，制约着因时利革的进步行动；这就决定我国从闭关走向开放进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在人物研究方面，有朱诚如的《嘉庆诛和珅述论》，王松龄的《论陶澍》，陈涴的《陶澍学术成就述评》，薛虹的《清宣宗旻宁的评价》等论文。

除了上述有关乾嘉道时期的文章而外，大会还收到一些其它方面的论著。如杨旸的《清朝先世建州女真斡朵里部社会经济结构探讨》，陈生玺《剃发令对清初的政治影响》，韦庆远、柏桦《清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谢肇华、何溥滢《清代的佃农》、张照东《清代大运河的经济价值与环境制约》，朱子彦《明清时期宝山地区市镇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陈然《清代前期四川的人口与盐业》，官美堞《清代山东的周村镇》、马楚坚（香港）《伊犁御塘道之创置与新疆开辟之关系》，张玉兴《清朝五修〈大清会典〉述评》，吴振清《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略论》，郭淑云《〈满洲祭天典礼〉论考》，王学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斯特莱特在东北—清末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侧面》等等。

从代表们提交的论文看，乾隆朝的研究已非常活跃，它几乎涉及到该历史时期的各个领域。相形之下，人们对嘉庆、道光朝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次会议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气氛，代表们畅所欲言，争相发表研究心得，阐述个人观点，在某些问题上还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辩。乾嘉道时期社会经济的评价，乾隆朝的涉外立法问题，如何看待近代爱国主义与近代开放之间的关系，乾嘉道时期的人口发展等问题，是学术交流中与会代表们普遍感兴趣的议题。

大会从8月25日开始，移至吉林市进行。在经过了一天的古迹考察之后，大会于26日闭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王俊义先生代表会议主办单位致闭幕词，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希望通过“1990年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乾嘉道时期学术探讨，将清史研究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